

新編諸子集成續編

中華書局

中
論
解
詁

新編諸子集成續編

中論解詁

(魏)徐幹撰
孫啓治 解詁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中論解詁/(魏)徐幹撰;孫啓治解詁. —北京:中華書局,2014.5

(新編諸子集成續編)

ISBN 978-7-101-09584-5

I. 中… II. ①徐…②孫… III. ①政論-中國-東漢時代②《中論》-注釋 IV. B234.991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3)第 205671 號

責任編輯:石 玉

新編諸子集成續編

中 論 解 詁

[魏]徐 幹 撰

孫啓治 解詁

*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發 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15%印張·2 插頁·330 千字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2014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1-3000 冊 定價:48.00 元

ISBN 978-7-101-09584-5

本書出版得到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專項經費資助

新編諸子集成續編出版緣起

新編諸子集成叢書，自一九八二年正式啟動以來，在學術界特別是新老作者的大力支持下，已形成規模，成爲學術研究必備的基礎圖書。叢書原擬分兩輯出版，第一輯擬目三十多種，後經過調整，確定爲四十種，今年將全部出齊。第二輯原來只有一個比較籠統的規劃，受各種因素限制，在實施過程中不斷發生變化，有的項目已經列入第一輯出版，因此我們後來不再使用第一輯的提法，而是統名之爲新編諸子集成。

隨着新編諸子集成這個持續了二十多年的叢書劃上圓滿的句號，作爲其延續的新編諸子集成續編，現在正式啟動。它的立意、定位與宗旨同新編諸子集成一脈相承，力圖吸收和反映近幾十年來國學研究與古籍整理領域的新成果，爲學術界和普通讀者提供更多的子書品種和哲學史、思想史資料。

續編堅持穩步推進的原則，積少成多，不設擬目。希望本套書繼續得到海內外學者的支持。

中華書局編輯部

二〇〇九年五月

前言

中論這部書，是寫成於後漢末期的儒學子書；中論的作者徐幹，卻在歷代著錄中或署魏人，或署後漢人，或乾脆不署明朝代。據三國志魏書王粲傳，徐幹卒於漢獻帝建安二十二年。但自稱多次與徐幹坐談、與他同時代的無名氏所作中論序，則說他卒於建安二十三年。究竟卒於哪一年暫且不論，徐幹卒於後漢則無可疑。不過，徐幹於建安中分別在曹操、曹丕手下任職。曹魏建國時，徐幹雖已於此前幾年去世，卻是屬於魏太祖（操）、文帝（丕）手下的臣屬，所以陳壽的三國志就把他附帶寫入魏書王粲傳中，隋書經籍志著錄中論也署爲魏太子文學徐幹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批評說：「幹字偉長，北海（劇按在今山東境內）人。建安中爲司空軍謀祭酒掾屬、五官將文學，事蹟附見魏志王粲傳（按魏志即三國志魏書），故相沿稱爲魏人。然幹歿後三四年魏乃受禪（按謂漢獻帝禪位於曹丕），不得遽以帝統予魏。陳壽作

史，託始曹操稱爲太祖，遂併其僚屬均入魏志，非其實也。」提要認爲，陳壽以魏爲「正統」，但魏受禪時徐幹已不在世，不得以君臣關係把徐幹歸屬爲魏人。然而後來范曄的後漢書未有徐幹的記載（范書另有一同名人徐幹，爲章帝時人），先於范書的袁宏後漢紀，以及謝承諸人所撰各種後漢書今所見佚文，也都不提徐幹，難道都遺漏了？其實，歷朝斷代史對人物記載的取捨，以及各史書經籍志、藝文志著錄作者所屬之朝代，不僅牽涉到作者的存歿年代，也牽涉到作者的仕宦等生平主要事跡，以及他對所經歷過的朝代有何影響。有的作者由前朝進入後朝，目錄署其朝代則或屬前朝，或屬後朝，也不是僅僅根據他的卒年。當然，這其中還受撰史者、著錄者的所謂「正統」觀念之限制。所以這個問題比較複雜，往往處理起來還自相矛盾。且看隋書經籍志，集部載有徐幹集五卷、應瑒集一卷、劉楨集四卷、陳琳集三卷。徐、應、劉、陳都屬「建安七子」人物，並且同年去世，隋志將前三人署作魏人，而陳琳則署作漢人。陳與徐、應都在曹操手下任過職務，都卒於後漢，那麼是根據甚麼標準劃分漢、魏的？元代郝經撰續後漢書，「升昭烈（劉備）爲本紀，黜魏、吳爲列傳」，一反陳壽奉魏爲「正統」，而以蜀漢續漢統。郝書在高士傳中收入徐幹，標「漢」；而

在文藝傳中收入陳琳、應瑒、劉楨，赫然標「魏」，這豈不自相矛盾？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以及宋史藝文志均著錄徐幹中論，而不署作者所屬朝代。但二唐志都把中論列於曹丕典論之後，這是傳統目錄學暗分明的方法，仍把徐幹歸爲魏人。通志藝文略著錄中論，署魏徐幹撰；又有徐氏中論，署魏太子文學徐幹撰，這是著錄誤重複，但都署魏。遂初堂書目著錄中論，也署魏徐幹。郡齋讀書志著錄中論，則署後漢徐幹。直齋書錄解題著錄中論，署漢五官將文學北海徐幹偉長，則把徐幹連同他的官職都歸爲漢。可見自隋志以下，唐宋以來公私目錄的著錄也不一致，大抵前期署魏而後期署漢。我根據隋書經籍志，將本書署名魏徐幹撰，理由是：第一，我以爲，新編諸子集成及其續編祇是一套按傳統方式整理的子學研究資料叢書，所以對叢書所收各個品種的著錄都依照傳統方式，而不是採用現代目錄學的方式。第二，傳統著錄方式對於作者的劃分是以朝代，而不是以生存年代，儘管二者之間的關係顯然，但不能完全等同，尤其在前後朝交替之際更是如此。而既然以朝代劃分，就牽涉到傳統史學觀念的一些問題，包括歷朝相承關係的「正統」觀念。第三，採用傳統著錄方式，應該根據目前能見到的最早著錄，就中論來說，是隋

書經籍志。至於傳統著錄是否合理，那不是整理者主要考慮的，整理者的任務祇是儘量客觀地提供該書著錄的歷史面貌，對著錄的研究、分析、判斷則是讀者的任務。要言之，就是整理者要儘量遵循史料的原始與客觀，儘管傳統的著錄存在不合理的東西，比如所謂的「正統」觀念就是。孟子引書太誓說「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是說上天的視聽就是來自百姓的視聽，那麼所謂承天命之「正統」，不就在民心之向背麼？但歷代史學幾乎都無例外地把這個「正統」看成是「帝統」的合法依據，而不認為是「民統」。

三國志魏書王粲傳記載徐幹事，祇有「始文帝爲五官將，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學。粲與北海徐幹字偉長、廣陵陳琳字孔璋、陳留阮瑀字元瑜、汝南應瑒字德璉、東平劉楨字公幹並見友善。幹爲司空軍謀祭酒掾屬、五官將文學」凡七十二字，再有就是「幹、琳、瑒、楨（建安）二十二年卒」一句而已。徐幹初任職「司空軍謀祭酒掾屬」，應該在建安元年之後，建安十三年之前。這個「司空」是指曹操的官職。據三國志魏書武帝紀，曹操於建安元年「拜司空，行車騎將軍事」，至建安十三年，改任丞相。後漢時，司空位居三公之一，但不帶兵打仗，沒有軍謀祭酒這類屬下（軍謀祭酒就是主

管軍事參謀的官)。但曹操還兼任車騎將軍，這是個專管討伐的高級武職，所以能設置軍謀祭酒，而徐幹就當了軍謀祭酒的掾屬即輔佐官吏。徐幹後任職「五官將文學」，應該不早於建安十六年。五官將即五官中郎將，是指曹丕的官職。據武帝紀，建安十六年，獻帝命曹丕「爲五官中郎將，置官屬，爲丞相副」。五官中郎將原本主管宮廷禁衛，但外加自置官屬之權，爲丞相之副職，權力自然在五官中郎將之上。因建安十三年漢廢除三公，設丞相，由曹操任職，所以建安十六年曹丕得以任副丞相。文學，本漢代的郡及所封王國所置，其職務史書無明文，大抵由文人擔任，掌管學校和教化。曹丕爲五官中郎將，而官屬置文學，是招攬人才之意，以備講學和顧問。隋志稱徐幹爲「太子文學」，那是用後來的稱號，因爲曹操在建安十八年進爵爲魏王，建安二十二年以曹丕爲魏王太子。無名氏中論序說：「會上公撥亂，王路始闢，遂力疾應命，從戍征行，歷載五六，疾稍沉篤，不堪王事，潛身窮巷，頤志保真，淡泊無爲。」所謂「上公撥亂」，指建安元年曹操迎接獻帝都許事。序稱徐幹「遂力疾應命，從戍征行」，是說他極力應從曹操之命，隨軍征伐，即指任軍謀祭酒掾屬事。但從曹之年應該不在建安元年，因爲序又說「歷載五六，疾稍沉篤，不堪王事，潛身窮

巷」云云，僅過了五六年，就因病「不堪王事」，去官居家，那麼假定建安元年就任職，是來不及後來又轉任曹丕手下的五官中郎將文學的。總之，徐幹在建安元年至二十二或二十三年去世之間，分別在曹操、曹丕手下任過軍謀祭酒掾屬和文學，但任此二職的具體起訖年代，則無確證考求。至於王粲傳裴松之注引先賢行狀，說徐幹「輕官忽祿，不耽世榮。建安中，太祖特加旌命（按旌命，招聘），以疾休息。後除上艾長（按除，授官。長，縣令），又以疾不行」，那應該是因病去官後的事，所以再次聘用才「以疾休息」、「以疾不行」的。王粲傳載曹丕致元城令吳質書信，稱徐幹「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所謂「有箕山之志」，是說有隱居不仕之志向。曹丕的信寫於徐幹卒後，「有箕山之志」也是就他後來不想做官說的，並非指他是未做官的隱士。清人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十一說：「李善文選注引文章志云：『太祖召幹以爲軍謀祭酒，轉太子文學，以道德見稱』（按李善引摯虞文章志見文選與吳質書注，歷官與王粲傳說同），則與文帝『箕山』之云不合，當以先賢行狀爲正。」何氏據先賢行狀，認爲徐幹未做過官，這是不符合事實的。文章志、王粲傳及無名氏中論序都說徐幹做過官，非無根據。藝文類聚五十九引徐幹西征賦有句云：「奉明辟之渥

德，與遊軫而西伐」、「伊吾儕之挺劣（按「劣」，當依嚴可均輯全後漢文作「力」），獲載筆而從師。無嘉謀以云補，徒荷祿而蒙私」。他是說承明王之厚德，隨軍西伐，同輩盡力，從軍記事，自己無良謀以助軍，徒受祿而蒙私愛云云，就是指隨軍出征事。至於「西伐」，據武帝紀，建安二十二年以前，曹操先後二次西征，即十六年攻馬超，二十年攻張魯，不知徐幹具體指哪一次。

另一個問題就是徐幹的生卒年。無名氏中論序說：「年四十八，建安二十三年春二月，遭厲疾，大命殞頽。」假如他因傳染病卒於建安二十三年，時年四十八，則當生於靈帝建寧四年（一七一年）。但王粲傳及文選與吳質書李善注引典略都說卒於建安二十二年，那麼假如享年四十八，就是生於建寧三年（一七〇年）。盧弼三國志集解說無名氏中論序的「二十三年」是「二十二年」之梓誤，因為建安二十二年疫病流行，明見後漢書孝獻帝紀。有人研究，據孝獻帝紀云（建安二十二年）冬，有星孛於東北。是歲大疫」，又武帝紀裴松之注引魏書載建安二十三年魏王曹操令云「去冬天降疫癘，民有凋傷，軍興於外，墾田損少，吾甚憂之」，認為鬧疫病是在二十二年冬，則序說「二十三年春二月」就不會是「二十二年春二月」之誤，所以徐幹應該是建

安二十二年冬被傳染疫病，而病歿於第二年春。今按孝獻帝紀祇是說建安二十二年冬「有星孛於東北（按星孛即慧孛，就是彗星，俗稱掃帚星）」，至於「是歲大疫」則是另說那年疫病大流行，並沒有限定是「冬」。因為如果是冬季疫病流行，則「是歲大疫」的「是歲」二字不應有，應該寫成「冬，有星孛於東北，大疫」。例如孝獻帝紀建安三年說：「夏五月，蝗。秋九月，漢水溢。是歲饑，江淮間民相食。」袁術殺陳王寵。孫策遣使奉貢。「是歲」以下三事也是說當年發生的，並非指同在秋九月所發生。裴注引魏書曹操令，則確指疫病發生在建安二十二年冬。但孝獻帝紀和續漢書五行志五都祇說建安二十二年發生疫病，沒有確指月份或季節。王粲是與徐幹同年得疫病死的，王粲傳說王粲卒於建安二十二年春，則又似疫病發生在當年春季，而不是在冬季。另外，清人錢培名認為，無名氏序說靈帝末年（中平六年，即一八九九年）徐幹「未及弱冠（即年未滿二十）」，則應該是十九歲，到獻帝建安二十三年（二一八年）正好與無名氏說年四十八染疫病而卒相合，參本書附錄一錢氏跋。這個說法有道理，但前提是認準無名氏序絕對可信，從而把後漢書、三國志及文選李注引典略等的有關記載全部推翻，包括與徐幹同年去世者的卒年。總之，由於史料

記載不一致，尚難確定徐幹卒年。他究竟是卒於建安二十二年還是二十三年，就現有史料所牽涉的事蹟看，一年之差無關大旨，讀者有興趣可以再進一步研究。

由後漢人仕於魏的王昶，最初也在曹丕手下當文學，認識徐幹，三國志魏書王昶傳記載他寫給兒子們的一篇告誡，其中說徐幹「不治名高，不求苟得，澹然自守，惟道是務。其有所是非，則託古人以見其意，當時無所褒貶。吾敬之重之，願兒子師之」。所謂「其有所是非，則託古人以見其意，當時無所褒貶」，是說徐幹有所議論，則依託古人來表達意思，而對現狀無所批評。如拿這話作為徐幹所著中論的評語，倒很合適。中論現存二十篇，每篇的議論幾乎都引「易曰」、「書曰」、「詩曰」、「孔子曰」、「傳曰」等經傳作為論據或補充說明，而議論中所援引的許多事例也都是古人往事。二十篇中除譴交等一二篇外，少有議論當前的。所以，中論的議論大多在述古諷今，依託論古以反襯當今。這也可以說明為甚麼徐幹在仕途上没有甚麼作為。曹操是個政治家，又善作文吟詩，重視招攬文人為己用，但他所喜歡的文人，要麼是懂謀略之士，比如郭嘉、荀彧等人，都能根據時勢為他出謀劃策；要不就是善於文辭，能寫出一篇打動人心的檄文之類的人，比如陳琳；對於那些通曉典籍、談

經說理的經學之士，此類理論家曹操並不看重，雖然也招攬了不少人。曹丕也是個政治家，但喜愛文學，能與文人相友。就中論之內容看，徐幹是個談經說理的儒學之士，並不善於揣摩形勢、應時設變地用謀略。他作西征賦，自己也說「無嘉謀以云補，徒荷祿而蒙私」。就中論之文風看，則屬於樸實無華。宋陳仁子文選補遺卷二十二引西山真氏（即真德秀）說「幹中論二十篇，文選以其澹泊無華，皆不之取」，明王世貞讀書後卷二讀徐幹中論說中論「頗樸而近於理」。這樣一個儒學之士，能從宏觀上說明修身治國之道，而不善一時之權變謀略，加上文風樸實而不講究辭令華采，曹操是不會重用的，而曹丕祇可視為文友。所以，徐幹的仕途不過是在曹操手下當參謀的僚屬，在曹丕手下當文學。

唐太宗說讀過中論復三年喪篇，見貞觀政要卷六；宋李獻民（淑）說中論另一版本有復三年（喪）、制役二篇，見文獻通考卷二百九引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這兩篇都不在今本二十篇中。羣書治要卷四十六節錄中論各篇，最後兩篇文字不見今本，前人根據內容，認為這兩個佚篇應該就是節錄自復三年喪和制役。本書收入的，就是今本現存的二十篇，加上羣書治要節錄的兩個佚篇。

關於本書整理方面的技術問題，都已在凡例中交待了。

關於本書內容，縱觀書中各篇，可粗略劃分爲兩大類，一是談修身處世之道，二是談治國爲政之方。今本原分二卷，談修身處世之道的各篇幾乎全在上卷，談治國爲政之方的各篇幾乎全在下卷。分二卷是後人編的本子，但各篇次第應該接近原著。禮記大學說「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是先有修身，然後才談得上治國。羣書治要雖然祇節錄了中論半數篇文，但各篇先後也與今本次序一致。所以，估計中論各篇次第大體上是徐幹自己安排的。各篇內容提要，可參看書後所附中論各篇內容提要。

從內容看，徐幹是個談經說理的儒家學者，中論全書基本都在闡發儒家的義理，同時也表達了自己的個人見解。他生當漢末亂世，但思想並不消極，而是積極入世的。他認爲當時士人輕視富貴，是因爲居位者皆小人的緣故，主張君子應該重視爵祿，積極進取，從而爲世建立功德。他根據儒家先修身而後治國的道理，以治學修道爲君子首務，先從正己做起，提出「凡學者，大義爲先」，讀書是爲「習道」明理，厭惡那些津津於訓詁章句而不明大道正理的「陋儒」，並對他們從心態、行爲及

其手段各方面作了辛辣的諷刺，同時也抨擊了當時交遊謀私的風氣。此外，他談到君子修身要注意虛心改錯，如何對待批評，以及甚麼是辯論、怎樣辯論等等，這些都有可取之處。他提倡選取人才要把才智放在德行之前，一反儒家理念，是因為他看到當時急需人才以解決嚴重的社會問題，這也正反映了他的人世態度。至於他談治國之道，大多是儒家常言。不過，他針對土地兼井問題提出限制奴婢使用，強調賞罰要有信用和施行賞罰要有節度，肯定曆法的準確與掌握戶口對治國的重要作用，這些都是值得注意的。

《中論》的整理，此前已有清儒及今人的校勘訓釋，著者也存有三十多年前所寫的札記舊稿。本書是在舊稿的基礎上，參考清儒及今人校勘成果完成的。本書的謬誤與缺點，懇望讀者諸君指正。這不是著者在說套話，因為即便七十老朽來日無多，無法進一步提高整理質量，讀者諸君的指點也會對後繼者有所幫助。後漢及魏、晉的子書，除了個別的，基本未經清代以上的學者整理過，近代人整理的也不多，而且許多都已佚失，一部分也祇存輯本，這就給今後的整理工作帶來困難。但雖有困難，也得有人去做，我們不能總是依賴前人的成果不思進取，不盡後死之責。古籍整理的發